

求解“中东之谜”的大胆探索

——兼评《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

毕健康**

中东，一片广袤肥沃、令人着迷而又困顿难解的土地。奔腾不息的尼罗河，滋养出震古烁今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孕育出激荡心魂的巴比伦文明。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中古时期，阿拉伯人南征北战，创造出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仿佛是照亮黑暗欧洲的一盏明灯。晚至近代初期，奥斯曼帝国的金戈铁马越过黑海海峡，挥师西进，多次威逼维也纳。巴尔干半岛的伊斯兰化，改写了欧洲的宗教、文明与政治版图。然而，阿拉伯帝国遥远的辉煌渐渐淡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与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了瓜分豆剖、纷争衰颓的碎片化的中东。2011年爆发的中东剧变，一时受到西方的欢呼，激起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期盼和发展梦想，然而阿拉伯世界内部碎片化的加剧与“伊斯兰国”组织乱世中崛起，击碎了中东国家的梦想。中东何去何从？如何破解百年中东发展的难题？这或许就是所谓“中东之谜”吧。

田文林是我国长期致力于中东问题研究的资深学者。他辛勤耕耘，厚积薄发，在梳理过去论著的基础上，从问题与出路这两个角度，对过去的作品进行浓缩精练、改写提升，推出了《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以下简称《困顿与突围》）一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孜孜以求的是一个“世纪之问”，即百余年来中东多灾多难，根源何在？中东如何“突出重围”，实现稳定和发展？

* 田文林 《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与“金砖五国”这样的崛起中的大国形成鲜明对比,人力资源丰富、油气资源富集、历史悠久的中东,在百余年的发展中遭遇严重挫折,至今仍然没有走上稳定与发展的康庄大道。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发动多场“反恐战争”,加剧了中东的动荡和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2011年以来的中东剧变和“伊斯兰国”组织的肆虐,使中东恢复稳定与发展离人们的视线更为遥远。为了回答今日中东难题的缘由,作者从政治思潮、中东剧变与中东突围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中东之谜”的起点,是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及中东国家在国家建构与现代化上面临的重大问题。诸如民族主义、现代化和国家建构或民族建构这样起源于西方历史并主导世界话语权的政治思潮,以其相对先进性伴随着欧洲的殖民渗透,移植到中东,与中东的本土文化发生直接冲撞,造成政治思潮与发展道路二元撕裂的悲惨现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前后,西方殖民势力分而治之策略的施行,使原本大一统的封建军事帝国裂变成诸侯争雄的碎片化的中东国家体系,分布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人从此长期在统一建国的梦想与列国逐鹿的现实中备受煎熬。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在现代化与发展道路上的艰难摸索,使阿拉伯兄弟国家在内政外交上渐行渐远。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重要成就,然而弊端很多,问题突出。1967年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进一步煽动了人们回归本土文化的情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把伊斯兰复兴推向高潮。

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阿拉伯国家从一开始就走上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形态与内部纷争。埃及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1952年“七月革命”后建立共和国。克里斯玛型领袖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掀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革命旋风,在阿拉伯世界形成进步的亲苏阵营。相反,阿拉伯半岛虽然是伊斯兰教诞生的圣地,半岛西部以汉志为核心的沿海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商业要道,但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或民族国家。崛起于半岛腹地内志的沙特家族,与瓦哈比运动

相结合，几起几落，最终在半岛建立起最大的政教合一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半岛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沙特王国占据半岛总面积的80%，国土面积达225万平方公里，自然成为海湾几个阿拉伯君主制小国的轴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与矢志不移“推销民主”的美国走得很近，形成保守的亲美阵营。

两条道路，两个阵营！然而，在威权政治的构建与破解发展难题的困境上，它们却殊途同归。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武力驱逐殖民势力独立建国，或是发动政变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权，如1958年伊拉克政变和1969年利比亚卡扎菲革命。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动力的革命，彻底砸碎旧世界，在建设新世界方面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走过了类似的道路。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国政权虽然在实现国家的独立上功不可没，在推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乃至工业化上成就斐然，但是内向型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问题。在政治发展上，则摆脱不了从军人政变、军人政权到威权政治的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阿拉伯世界处于传统的农、牧业社会阶段，稀疏的近代工业和商业政治中心——城镇，只是一种点缀。这样的社会基础，很难迅速构建和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维护政治稳定的现实需要，使这些政权“往往特别强调民族主义政权阶级基础的广泛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众性”，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奉行民粹主义政策。在政治上，“激进的去制度化行动”正确地否定了旧政党和旧民主。卡扎菲在《绿皮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党是现代的部落，是教派。一个政党统治下的社会，完全像一个部落或一个教派统治下的社会一样。”^①当下伊拉克和利比亚残酷的政治现实，难道不是卡扎菲这个断言最有力的佐证？

然而，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构建“非政治的”民众国家，却最终落入了直接民主假象与克里斯玛型统治外壳下的威权政治。田文林指出“直接民主与克里斯玛型统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直接民主导致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对具有超凡魅力领袖的深切期待；而那些强化领袖个人作用的克

^①（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第19~20页。

里斯玛统治,它们所要求的也是那种不受任何政治制度牵制,声称权力直接来自人民的直接民主制。”^①总之,中东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即从民族主义到民粹主义,从克里斯玛型统治到军方主导的威权政治的变迁。

相对而言,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逻辑与政治演变更加简单和直接。沙特王国的执政者不需要从西方的人民主权论的逻辑起点出发进行政治阐释,建立和维护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万物归于安拉,一切源于真主,真主主权至高无上。沙特国王兼任宗教领袖,因此沙特王国这样的传统威权国家的逻辑基础是牢靠的。幸运的是,海湾地区石油的海量商业开采及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油价的飙升,使这些传统威权国家以巨额石油“租金”在国内奉行民粹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出手大方,游刃有余。殊途同归的阿拉伯威权政权,在遭遇突尼斯小贩自焚之火的延烧时的际遇,大同小异抑或迥然不同?

二

总的来说,一开始阿拉伯知识界也对这场“民主革命”感到欢欣鼓舞。当年艾哈迈德·札维勒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埃及举国欢庆,侯斯尼·穆巴拉克总统亲自接见了,并宣布以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名在开罗创办一所大学。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亲自冲上开罗解放广场反对穆巴拉克政权!札维勒是受到西方民主理论影响的阿拉伯右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在阿拉伯威权政权压抑下的愤怒终于如火山般爆发出来。在中国,人们对于这场剧变的观察和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围绕中东乱局性质的争论,大致分为两派。正如中国原驻埃及大使安惠侯指出“一派认为是‘民主革命’、‘阿拉伯之春’,与美(国及)西方的论断相同……有些学者在研讨会上厉声指责不赞成将这场抗议运动认定为‘革命’的人:‘不支持人家革命,就是反革命’”“另一派认为,从种种迹象看,抗议浪潮是民众对现实不满的自发行动,主要是希望改善民生,同时反对社会不公、要求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但这场没有明确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和众望所归领袖的群

^① 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第12页。

体性自发抗议运动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容易引发暴力冲突，导致社会动乱……不要急于定性为‘革命’……”^①

在这场热烈的争鸣与讨论中，一些学者以“局外人”的冷静，拨开重重迷雾，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从方法论与事物本质两个层面，做出了符合实际、经得起考验的论述。田文林是其中敢于坚持、论述周全、见解深刻的杰出代表。在推翻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威权暴政、专制独裁的欢呼声中，一些阿拉伯大学者甚至沉醉于所谓民主与独裁博弈的表象，田文林则以“四两拨千斤”的灵巧，回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厘清了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一下子抓住了“中东剧变”的本质。

政治的本质，简单地说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个“谁”，不是人的生命个体，而是阶级。政权的本质，亦即国体，就是政权的阶级性质。政体，亦即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为国体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体，在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采用不同的政体。因此，民主作为一种政权的组织形式——政体，既可以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民主”本身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更非“普世价值”。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建立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实际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朝气，致力于民富国强的现代化事业。这些国家为了夯实自己的阶级与社会基础，增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大多声称消灭阶级或弥合阶级鸿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唯落后的封建大地主和旧官僚等反革命分子例外。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公有制经济与民族工业的发展，不仅显示这些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有效地缓解了贫富差距，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向下看”的政策戛然而止，转而“向上看”，“转为服务于社会中上层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裁”。^②

政权的阶级基础发生漂移，直接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

① 安惠侯 《观察中东局势应避免严重误判》，《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田文林 《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第70页。亦参见田文林《中东变局的原因分析》，载朱威烈、刘中民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中东变局的多维透视》，时事出版社，2013。

在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执政以后,公开否认纳赛尔式社会主义,萨达特政权精英复活被纳赛尔政权镇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旧官僚,与之结成经济和政治联盟,直至结成姻亲。萨达特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与埃及实力最雄厚的大资本家奥斯曼家族联姻,造成严重的腐败问题。所谓的开放政策,就是直接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当然也为西方垄断资本打开了大门。

首先,埃及的开放政策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先后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逆转了民族工业发展及工业化的势头,使这些国家在许多崛起中的亚非拉国家凯歌高进的时期,长期裹足不前,错失了发展机遇。根据2009年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阿拉伯世界工业化水平比20世纪70年代还低。^①

其次,“改革”成为资产阶级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政治工具,改革使改革者亦即资产阶级更加富裕,私有化往往成为权钱交易的合法平台,腐败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的常态。兰德公司出版物指出“腐败已成为该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裙带主义到直接受贿,国家高度介入经济生活,为公职人员腐败提供充足的机会。几乎没有国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已经深深地融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据估计,阿拉伯世界1/3的国内生产总值被腐败吞噬,5%的人支配80%的财富。在埃及,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55%。^②

最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困问题极为突出。纳赛尔式社会主义虽然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节制私人资本,减少地主占地,控制地租和房租,限定城市个人的最高收入,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允许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与分红,实行大、中、小学免费教育及中学以上毕业生包分配,普及社会福利事业等,有效地缓和了各阶级的收入差距。^③埃及学者阿宰特·海贾扎提供的贫困率数据,有力地证明了萨达特时期两极分化再次加剧的现实:1958/1959年埃及农村贫困率为35%,1964/1965年下降到26%,1974/1975年回升到44%;同期埃及城市贫困率分别为30%、27%和34%。穆巴拉克虽然不断高呼保护有限收入阶层的利益,实际上沿着萨达特开创

①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http://www.arab-hdr.org>, 转引自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第44页。

② 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第72~73页。

③ 参见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第151页。

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埃及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以上贫困线测算的农村贫困率，1981/1982年为26.9%，1990/1991年达39.2%，1995/1996年高达50.2%；同期城市贫困率分别为33.5%、39.0%和45.0%。^①城市和农村贫困率一路飙升。据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1月17日报道，埃及仍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

以埃及为典型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政权阶级基础的漂移，造成上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终演变为政治危机。这是因为，虽然穆巴拉克们愿意照旧统治下去，穷困的阿拉伯民众却不愿意照旧被统治下去。他们受够了，他们走上街头。西方植入的“民主”旗号，是对这场危机的故意误读和误导，如同马车套在马之前，如何驾车？

病症决定处方，舵手决定航向。阿拉伯剧变如果真正“剧变”成为革命，那就要彻底推翻旧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即便不是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那么至少要恢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活力的民族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把漂移的阶级基础重新漂移回来。然而，“阿拉伯之春”显然不是这样的一场革命，缺乏领导阶级，民众群龙无首，没有组织结构，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和政治纲领。^②

没有舵手，街头运动便会失去方向，“有毒的民主”反而搞乱了阿拉伯国家，使之陷入严重的动乱。埃及和突尼斯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不是简单地推翻旧政权就能大功告成，而是要调整生产关系，巩固上层建筑变革的成果，为生产力发展和民众福祉开辟现实的道路。相反，这些国家在政权更替后，没有也不可能“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革命与民主就成为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因为实行宪政民主，就“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这就从法理与实践层面消解了革命。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改革到来的代价就是以专断政府来压制意愿的表达和历史悠久的国家制度；而维护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保留已经过时的老一套特权、财产、

①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68、373页。

② 马晓霖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干干净净的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来敌人阴谋唆使。参见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出版社，2012，“前言”，第2页。

专权、阶级结构和教会参与国家制度。”^①

西方故意误导的“有毒的民主化”，就这样把阶级掌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悄悄地转变成宪政民主这样的政体问题，回避了国体的转变。田文林对中东剧变下的民主闹剧给出了鞭辟入里的评论：“民主重建进程看似热闹，实则是在‘政体变革’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很难实现统治阶级更替，更难触及经济结构变迁。指望通过民主选举改变不合理政策路线，无疑是缘木求鱼。”^②因此，中东剧变的任务，不是以所谓的民主代替独裁，从集权或威权走向分权制衡，而是以“革命者的专政”取代“反革命者的专政。”单从技术层面讲，所谓中东民主转型，就是颠倒黑白，搞错了方向。民主政治的基本特质就是政权通过选举轮流坐庄，多党竞争、分权制衡，从一开始就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西方的有识之士亦深切感受到民主政治进程中相互扯皮、妨碍政府运行等严重弊端。显然，这种华而不实，好看不中用的玩意儿，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利益纷争和意识形态分歧，加剧政治对抗，对于已经天下大乱的中东乱局无疑是火上浇油。从中长期看，中东国家要“完成未完成的革命”，亦即实现富民强国、国泰民安的梦想，也必须集中资源办大事，更要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做出正确抉择。坦率地说，这需要政治家的勇毅与智慧，需要“集中”，仅靠选举政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三

对于大中东动乱纷扰、外祸连年，人们难免慨叹“这一切都是石油惹的祸！”西方学术界和智库的这种渲染和媒体的起哄，似乎抓住了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命门，实则谬矣！田文林诘问“俄罗斯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何西方国家却不敢打俄罗斯的主意？”打个比方，两家人都有金砖，其中的一家没有养凶猛的狼狗看家护院，强盗堂而皇之入室抢劫，另一家则庭院深深高墙护院，还雇用私人保安公司武装守卫，自然平安无事。国家的强大与弱小，其第一要素，亦即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国土面积的大

① 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第85页。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1996，第146页。

② 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第85~86页。

小与人口的多寡，其次才是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大是强的基础与前提，小国寡民虽富犹弱，海湾阿拉伯石油国家依靠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不就是最好的佐证么？西方搞垮了苏联，然而俄罗斯仍是世界大国，其广袤的疆土、庞大的人口规模、富集的资源与强大的军工实力使之具有继续挑战西方霸权的潜力。因此，北约继续东扩，围堵和遏制这头“北极熊”。

欧洲殖民列强分裂中东伊斯兰世界，则比搞垮苏联要成功得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挑唆阿拉伯人反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后阿拉伯地区列国纷争，再到打德国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悲情牌成功地在巴勒斯坦建立“第三圣殿”——现代以色列，伊斯兰教世界乃至阿拉伯世界统一的梦想最终灰飞烟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保障的中东秩序与和平，一去不复返，中东人民一再陷入战争与动乱的苦难深渊之中。

以色列是阿拉伯人胸口永远的痛。经过几场中东战争的锤炼，以色列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下愈战愈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同“刺入阿拉伯世界胸膛的一把尖刀”。丘吉尔坦率地承认：“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不但对犹太人有好处，而且能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①阿拉伯人则一再败走麦城。延续不断的阿以战争和冲突，不仅挤占了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宝贵资源，而且加剧了中东的动荡与地缘政治竞争，固化了中东的碎片化格局。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围绕阿以冲突，以埃及和沙特王国为首的两大势力长期博弈。1973年“斋月战争”后，埃及独自启动中东和平进程，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空前孤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总部从开罗迁到突尼斯。沙特王国则以巨额的石油美元为后盾，乘机抢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导地位，1981年8月提出实现中东和平的“八点建议”。

当然，阿拉伯人民对于阿拉伯世界碎片化的缘由及其后果，是有清醒认识的，并不任由域外强权国家的摆布。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不只是埃及人民的好儿子，还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为阿拉伯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和统一事业鞠躬尽瘁。1958~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短暂地统一为一个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就是阿拉伯世界走向统一的尝试。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及先后被美国置于死地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①（英）罗伯特·斯蒂文斯《纳赛尔传》，王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35页。

和利比亚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均有推进阿拉伯国家团结乃至统一的雄心壮志,这也正是后两者死无葬身之地的关键原因。然而,正如破镜不能重圆,分了家的兄弟无法再重新组成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一样,各阿拉伯国家逐渐累积自身的国家利益,形成各自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外交方略。阿拉伯统一虽然叫得响、喊得多,但是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同床异梦,各有心机,甚至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和以大欺小的情况,统一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相反,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比如20世纪60年代埃及和沙特在也门的间接战争,成为阿拉伯世界残酷的新现实,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

进一步说,从阿拉伯民族形成与历史发展来看,“阿拉伯统一”可以说根基不深。

阿拉伯人起源于干涸的阿拉伯半岛,与沙漠和骆驼为伴,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即贝都因人。阿拉伯各部落为争夺牧场和水源而相互厮杀,流行血亲复仇,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宗派主义与分裂传统十分强大。阿拉伯半岛南部和北部的阿拉伯人相互攻伐,部落战争绵延不断。在伊斯兰教诞生前的百余年,有据可查的部落战争达1700余次。^①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突出对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崇拜,倡导“穆民皆兄弟”,对于遏制阿拉伯人内部的仇杀与阿拉伯人从部落走向民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阿拉伯人一手高举《古兰经》,一手紧执锋利的宝剑冲出阿拉伯半岛。7世纪40年代到10世纪末,阿拉伯人向西亚北非大迁徙,造就了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辉煌。阿拉伯人大扩张,半岛阿拉伯人博采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文化之长,阿拉伯人也从简单的血缘概念变成血缘、宗教(伊斯兰教)和语言(阿拉伯语)交叉的复合概念。换言之,阿拉伯人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而统治阶级为维护大帝国的治理而采取的分化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阿拉伯人的部落主义传统。

阿拉伯民族特殊的形成历史筑就了其特殊性。阿拉伯人既是一个民族,又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一个分裂(为多个国家)的民族。杨灏城教授早就指出了一个被忽视的重要史实——“如今的阿拉伯地区在历史上仅在倭

^① 杨灏城《阿拉伯人的团结和分裂——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载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人民出版社,1996,第5页。

马亚王朝统治时期保持了统一局面。阿拔斯王朝建立不久，阿拉伯帝国已开始分裂……纵观这一地区约1400年的历史，其统一时间很短，约100年，分裂时间很长，近1300年。”^①半岛上游牧的阿拉伯人在生产力、生产方式及文化上均极大地落后于被征服地区的埃及人、波斯人，因而阿拉伯民族先天发育不良。

首先，各地方言林立。以《古兰经》为基础的标准阿拉伯语，如今基本上是书面语言，主要用于著书立说、诵读《古兰经》和新闻广播。普通老百姓只能听，不能讲，其使用范围愈来愈小。相反，文学艺术作品大量使用方言，其中埃及方言在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因此，阿拉伯人虽然共享标准阿拉伯语，但是各种方言的出现尤其是文艺作品基本上使用方言，实际上分割了各国阿拉伯人的情感世界，这反过来加速了阿拉伯各国的分化。

其次，被征服的先进文化，反而征服了征服者，增强了阿拉伯民族的“地方主义”特色，使阿拉伯民族具有多元性和分裂传统。比如，埃及仍然保留许多法老文化成分，埃及的阿拉伯方言吸收了一些科普特语。波斯的专制传统与发达的官僚制度对阿拉伯帝国的重大影响，就更不用提了。

最后，民族自我意识不稳定。阿拉伯人很“开放”，把阿拉伯帝国分裂后的外族王朝视为“本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埃及人仍然为库尔德出身的萨拉丁的丰功伟绩而无比自豪。近代埃及的奠基者穆罕默德·阿里也是阿尔巴尼亚人。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感情此起彼伏，波动不居。在突厥人和奥斯曼人统治期间，阿拉伯人民族意识下降，宗教感情上升。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19世纪末沙姆地区成为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祥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纳赛尔的感召与推动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进入高潮。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70余年的曲折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团结之不易，摆脱破碎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之艰难。阿盟于1945年3月22日在开罗正式成立，比联合国的诞生还要早半年。创始成员国为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22个阿拉伯国家全部为阿盟成员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熄灭、不少阿

^①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第40页。

拉伯地区还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形势下,阿盟作为尚待扩大的区域政府间组织,其根本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协调成员国政策,以便实现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捍卫其独立,关注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抵御外来侵略和防止、解决成员国之间的战争,是阿盟的主要使命。《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第6条规定“在一国侵略或威胁侵略某成员国的情况下,受到侵略或侵略威胁的国家可以要求立即召开理事会。理事会将一致通过,决定击败侵略的必需的措施。如果侵略者是成员国,该国的投票不计入一致通过。”宪章第5条禁止成员国以武力解决争端,理事会将斡旋两个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可能导致战争的争端。仲裁和斡旋决议将以多数票通过。可见,阿盟的首要使命是维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与相互之间的和平,促进团结合作、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旗舰组织,阿盟又不断地高举阿拉伯统一的大旗。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潮时期,纳赛尔竭力借助埃及主导的阿盟,促进阿拉伯团结和统一大业。1963~1972年三个“进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分享同样的国旗。“阿拉伯国家联盟被广泛视为通向阿拉伯统一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再走一步,就完全融合成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①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盟均程度不同地发挥了协调阿拉伯国家力量抵抗以色列的作用。在管控阿拉伯世界内部争端与冲突上,阿盟亦有多个成功的案例,在1961年伊拉克与科威特边界争端中,阿盟向科威特派驻阿拉伯部队。1963年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发生边境战争,阿盟成功斡旋,使两个阿拉伯兄弟邻国化干戈为玉帛。

然而,与欧共体(欧盟)和东盟乃至非统组织(非盟)逐渐推进一体化形成鲜明反差,阿拉伯国家联盟不仅在促进阿拉伯政治统一上最终一事无成,而且在推动经济合作等方面亦严重滞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阿盟不仅没有调解内部分歧,反而把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埃及被开除出阿盟。在1979年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后,阿拉伯统一的口号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90~1991年海湾危机中,阿盟未能成功斡旋伊拉克与科威特争端,伊拉克大军侵占科

^① Farah Dakhllallah,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Regional Security: Towards an Arab Security Community?" i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December 2012, 39 (3), p. 402.

威特，阿拉伯世界一分为二——亲伊拉克阵营和反伊拉克阵营，最终只能引狼入室，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队解放科威特。虽然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参加多国部队，但是显而易见，单靠阿拉伯国家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与军事实力，难以解决海湾危机。虽然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阿盟在利比亚问题和叙利亚内战上比较活跃，2011年2月暂停利比亚成员国资格，11月在黎巴嫩和也门反对的情况下暂停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成员国资格，在不干涉内政和一致同意两大原则上出现突破，但是阿盟面临巨大挑战，主要是阿盟自己的弱化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GCC）作为亚区域组织的加强趋势。其背后，则是相互争雄的埃及与沙特阿拉伯作为阿拉伯和中东地区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

实际上，自阿盟成立之日起，阿拉伯统一就只是一种民族感情和政治口号，并非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各阿拉伯国家建立伊始，就产生了超越阿拉伯统一梦想的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1943年在埃及亚历山大举行的阿拉伯领导人会议拒绝了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组成联邦的提议。阿盟传达了阿拉伯团结的信号，但是实际上“保障了阿拉伯各国的独立与主权”。“主权赤字处于中东秩序（混乱）的中心”，中东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还在与夸大的主权危机做斗争”^①。因而，放弃阿拉伯统一幻想，巩固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反而有利于稳定地区秩序，为中东逐渐走出困境提供较好的地区环境。

四

丢掉阿拉伯统一幻想，回到主权国家现实。

既然主权国家是中东秩序的核心，那么陷于困顿的中东的突围主体也必然是主权国家。《困顿与突围》一书，从内政、外交两大层面，探讨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发展道路，力图回答中东国家如何突围这个难题。坦率地说，“中东突围”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之谜，是中东国家近百年来艰难地上下求索的过程，至今仍然没有找到

^① Farah Dakhllallah,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Regional Security: Towards an Arab Security Community?”, pp. 397, 400 - 401.

完整的答案,仍在摸索之中。实践的滞后决定理论的落后,但是田文林依然在挖掘中东国家实践的基础上,努力找寻中东国家突围的方向与路径。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亦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巴列维国王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伊朗逐渐沦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日益向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集中,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受到严重打压,最终引爆了一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阶层领导的“革命”。由于宗教阶层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及其在政权构建中的主导地位,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至于许多国内外学者把霍梅尼政权定性为“伊斯兰政权”或“神权政府”。实际上,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政权与1952年七月革命后的埃及纳赛尔政权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国家政权由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在埃及以自由军官组织为代表,在伊朗则是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宗教集团)执掌。差别在于,纳赛尔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霍梅尼则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

这样一来,伊朗的突围受到严重制约。第一,执政的宗教阶层在很大程度上走上了巴列维国王时期权贵资本主义的老路,民粹主义光打雷不下雨。例如,在通过土地改革缓解农村地区两极分化上,甚至还不如巴列维国王时期。相反,通过公有部门(国有企业)、伊斯兰基金组织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庞大企业网络,执政的大资产阶级控制伊朗经济命脉和绝大多数资源,私有部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地盘受到极大的挤压,经济动力不强,活力不够,当然还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拉夫桑贾尼时期(1989~1997)和哈塔米时期(1997~2005),伊朗朝着自由市场经济方向的不彻底的改革,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2005年内贾德总统上台后,钟摆回摆,高呼社会正义。虽然内贾德时期伊朗石油收入猛增,但在既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上小修小补无济于事,“撒钱”式的民粹主义政策不但因为补贴对象过于宽泛从而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挤占了生产领域的投资,掏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二,由于与美国的长期对抗,伊朗孤立于世界经济。伊朗核问题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收紧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切断了伊朗发展亟须的资金、技术和关键设备,伊朗经济越来越困难,民生日艰、遑论发展。第三,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动因,还是教派之争,抑或仅仅是地缘政治争夺,伊朗采取咄咄逼人的革命主义外交,对于

海湾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和以色列均构成巨大压力。后者的反弹是必然的，这就造成海湾乃至中东地区长期失序失衡，不利于伊朗和中东的稳定与发展。

埃及的突围，依然困难重重。纳赛尔代表了具有一定生机与活力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通过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向中下阶层倾斜的社会政策，使埃及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工业化与现代化上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1970年底执政的萨达特，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开放政策的名义重建大资产阶级经济与政治统治。穆巴拉克执政后萧规曹随，沿着萨达特的开放政策继续前进，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并使埃及自2011年以来持续陷入动乱。与伊朗受到美国的遏制、打压不同，萨达特执政以来埃及向美国“一边倒”，穆巴拉克时期表面上奉行均衡外交，但是西方资本与技术的流入要么很有限，要么没有进入生产部门，埃及的工业化不进反退。虽然穆巴拉克一再高呼埃及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工业，现实却恰恰相反，所谓的四大支柱部门——石油出口、旅游业、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和侨汇，无一不是实体工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和地区形势波动的冲击。当然，以埃及的资源禀赋与国际竞争力，也的确很难全面开花，建立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然而，过往的寄生性发展路径，显然已经被堵死了。如何找准埃及的比较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埃及经济体制与优势产业布局上取得重大突破，是当下塞西政权的急迫任务。当然，其前提是埃及实现国内的政治和解，初步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

相对而言，从凯末尔建立共和国以来一直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土耳其，发展得比较顺利。土耳其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17位，是“展望五国”和“20国集团”成员，2011年以来的中东乱局中难得的“稳定之锚”。然而，田文林研究土耳其私有化的前因后果，揭示出土耳其的突围之路并不顺畅，相反，“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从本质上说，私有化的指导思想，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是披着隐身衣的新殖民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为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而量身制造的慢性毒药”。卡尔·波兰尼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原教旨主义，“自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这样一种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市场怎么可能在国家之外的真空中运行呢？西方鼓噪私有

化,软硬兼施,在广大亚非拉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是因为国际垄断资本看重其垄断租金。迈克尔·赫德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化不过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一场攫取垄断权和租金的运动,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① 相关数据表明,私有化并未提高土耳其经济的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并未使土耳其工业结构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反而陷入“依附性陷阱”。更严重的是,它加强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与剥削。2000~2013年,土耳其私有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1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15.4%。中间阶层受到挤压,两极分化严重,20%的最富有人口占据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的20%仅占总收入的6%。土耳其贫富差距超过14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5个国家中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可见,中东国家的突围似乎仍处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唯有解决“依靠谁,为了谁”这个简单的根本性问题,才能拨开云雾见青天,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阳光大道。假如剧变中的阿拉伯国家对该问题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场剧变就会从乱局走向革命,至少为中东的突围找准了方向。

[责任编辑:李福泉]

^① 参见田文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第188、197页。